

季羨林

散文新编

两行写在泥
土地上的字



季羨林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季羨林

散文新编

两行写在泥
土地上的字



季羨林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季羨林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季羨林散文新编)

ISBN 978-7-02-010359-1

I. ①两… II. ①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6034 号

责任编辑 杜 丽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插页 3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359-1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救救小品文	1
大学外国语教学法刍议	4
论自费留学	8
邻人	11
对于新诗的一些看法	14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	18
春满燕园	21
师生之间	23
燕园盛夏	27
那提心吊胆的一年	30
春归燕园	35
清华颂	38
芳林新叶催陈叶	40
我的处女作	42
坐拥书城意未足	46
《大唐西域记校注》成书经过	48
我和外国文学	52
外语教学漫谈	59
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	63
我和外国语言	71

遥远的怀念	87
梦萦未名湖	94
我与百花	99
梦萦水木清华	101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104
藏书与读书	109
我和北大图书馆	111
我与《世界文学》	114
《怀旧集》自序	116
跨世纪中国人该读什么书	119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123
汉城忆燕园	129
《神州学人丛书》序	135
《蒙田随笔全集》序	140
我看北大	145
我和北大	149
我与东方文化研究	154
漫谈北大派和清华派	159
梦萦红楼	162
祝贺与希望	164
论博士	166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168
论教授	171
我和《大公报》	173
我看中国文化书院	176
温馨的回忆	177
风雨同舟五十年——我和民盟的关系	179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182
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185
清华梦忆	190
欢送北大进入新世纪新千年	193
一个预言的实现	195

中国是小说文物的国家，这只要一看就看得出来。在外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精英，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贵族。在中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平民，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贱民。

中国是小说文物的国家，这只要一看就看得出来。在外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精英，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贵族。在中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平民，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贱民。中国是小说文物的国家，这只要一看就看得出来。在外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精英，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贵族。在中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平民，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贱民。

中国是小说文物的国家，这只要一看就看得出来。在外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精英，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贵族。在中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平民，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贱民。中国是小说文物的国家，这只要一看就看得出来。在外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精英，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贵族。在中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平民，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贱民。

中国是小说文物的国家，这只要一看就看得出来。在外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精英，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贵族。在中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平民，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贱民。中国是小说文物的国家，这只要一看就看得出来。在外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精英，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贵族。在中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平民，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贱民。

中国是小说文物的国家，这只要一看就看得出来。在外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精英，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贵族。在中国，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平民，小说家才算是文学的贱民。

救救小品文

自从鲁迅先生把小品文封为小摆设以后，一向沉寂的小品文蓦地热闹起来。但它却倒了霉。

中国是小品文的国家，这只要一想就会明了的。在外国，所谓文学者往往分为诗歌、小说、戏剧三大类。小品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然而在中国呢，小说、戏剧是不被人认为是文学的，剩下的只有诗歌，来填这个空的是小品文，所谓某某文集者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品文，而这些文集的作者就正占据着文学史顶显赫的篇幅，例如唐宋八大家、桐城派等不都是每天挂在人们嘴上的吗？

然而在这样一个小品文的国家里，小品文却一向给人利用。在极渺远的时代，我们就看到小品文的萌芽，似乎一下生就走着黑运，给大人先生们拿来做载道的工具，一直到魏晋六朝，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人们用小品文来说自己的话，然而引起了哄笑和嘲讽，说自己话的小品文也就被埋在这哄笑和嘲讽里，度着自己的暗淡的命运。

于是到了明末，我们又看到人们用小品文说自己的话。然而又引起了哄笑和嘲讽，说自己话的小品文又被埋在这哄笑和嘲讽里，外面又贴上“满洲”皇帝禁书的封条，喘不上气来，一直到新文学的起来，小品文依然在寂寞暗淡里活下去。

最近又有人说新文学的成功就是小品文的成功了，他们提倡

小品文,提倡明末人的小品文,这使我高兴,我自己想,不管怎样,居然有人在哄笑和嘲笑里注意到小品文终归是好的;然而不久我却发见他们作起斗方诗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名士,只有名士才能把白话文里加上之乎者也,而美其名曰语录体,在名士们自己摇头摆尾之余,恐怕很有一些陶然的逸趣,但在我们俗人看来,却正像看一个猴子穿起人的衣裳来,忸怩作态,顶大的用处也不过催人呕吐。明末的小品文是好的,但我们却不愿意看见死鬼在活人身上复活!

然而我们终于有了小品文大师,小品文也终于倒了霉。

于是鲁迅先生看出小品文的危机来了,接着是一片闹嚷嚷哄声。鲁迅先生是说了自己的话,但在这哄声里我们却听不出什么东西,先是热烈地攻击小品文,仿佛小品文这三个字就反革命,无论是谁,只要作小品文就是封建余孽,因为英国小品文作家特别多,于是我们这些聪明而又勇敢的批评家(?)又把英人的意识鉴定了一下,结果判了英人是毫无希望的民族,一个响应着一个,这哄声延长下去,个人都把自己的嘴脸表演一番,但在这庞杂混乱里我却只见到愚妄与浅薄!

接着是一个转机。人们发见了,小品文是随便可以注入任何东西的,他们不再骂小品文,而只骂小摆设似的小品文。他们要求匕首,于是又一个接着一个,把自己的嘴脸表演一番,这哄声终于又延长下去,拿着纸剪的匕首,他们要的,坐在软椅里喊着拿匕首却动也不动的,他们要的,从没看到过匕首,只把自己梦里的影子画出来的,他们要的——他们要一切这样的匕首,但有谁有过真铁真钢的匕首吗?上帝知道。

小品文终于给他们利用着,终于倒着霉。

而且还要倒下去。在混乱庞杂里我们要救救小品文,我们要小摆设,只要它真的是从内心里流出来的,我们将不眩惑于纸糊的

大摆设,我们也要匕首,只要它是真铁真钢的,我们将不眩惑于纸剪的玩意儿。我们绝不能忽视了文艺里的“真”。

1934年8月23日

大学外国语教学法刍议

我们学习外国语，不是在大学里才开始的。从中学起，有的人甚至从小学起已经学起外国语来了。但是小学生和中学生智力发展尚未成熟，所以他们应该有他们独特的学法，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要讨论的只是大学里外国语的教学法。

我这里说的外国语是指的平常所谓第二第三外国语，就是在大学里才开始学的。在中国读过大学的人大概都有学习第二外国语甚至第三外国语的经验。有的学一年，有的学两年三年甚至四年。学习的期间虽有短长，但倘若问一个学过的人，他学的成绩怎样，恐怕很少有不摇头的。

我也在大学里学过两种外国语。教务处注册股的先生们或者认为我已经学成了。因为在他们的本子里我的分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还因了其中一种的分数特别好而得到出国的机会。但是我却真惭愧。送我出国的这一种外国语还是我到了它的本国以后才学好的。另外一种也是在那个国度里学到能看书的程度。同我同时学的朋友们情况也同我差不多。当然，这里也正像别处一样天才是缺不了的。他们念上十页八页的文法，一百个上下的单字，再学会了查字典。以后写起文章来，就知道怎样把英文的 *As if* 翻成德文的 *Als ob*，括弧里面全是洋字，希腊、拉丁、德文、法文全有。这样就很可能吓倒一个人。至于他们能不能看书呢，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虽然有这样的天才撑场面,但人们还是要问,为什么中国大学生学外语的成绩这样不高明?难道他们的资质真不行吗?我想无论谁只要同外国大学生在一块念过书都会承认,我们中国学生的天资并不比外国学生差。原因并不在这里。

但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这问题我觉得也并不难回答,我们只要一回想我们自己学习外语的经过和当时教员所用的方法就够了。普通大概都是这样:教员选定一本为初学者写的文法,念过字母以后,就照着书本一课一课地教下去,学生也就一课一课地学。速度快的,一年以内可以把普通文法教完;慢的第二学年开始还在教初级文法。有的性急的教员等不到把文法学完就又选定一本浅明的读本一课一课地讲下去。学生在下面用不着怎样预备,只把上一次讲过的稍稍看一看,上堂时教员若问到能够抵挡一阵,不管怎样糊涂,也就行了。反正新课有教员逐字逐句讲解,学生只需在半醒半睡中用耳朵捉住几句话或几个字就很够很够了,字典是不用自己查的。于是考试及格,无论必修或选修都得了很好的分数,堂皇地写在教务处注册股的大本子里。教员学生,皆大欢喜。

就这样,学上两年甚至三年外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以外,普通学生大概都不能看书。最初也许还能说那么十句八句的话,但过上些时候,连这些话也忘净了,于是自己也就同这外国语言绝了交。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大好光阴白白消耗掉,这已经很可惜了。但更重要的却是放掉一个学习现代学者治学最重要的工具的机会。现代无论哪一国哪一门的学者最少也要懂几种外语,何况在我们这学术落后处处仰给别人的中国?而且这机会还是一放过手就不容易再得到,因为等到大学毕业自己做了事或开始独立研究学问的时候,就很难再有兴致和时间来念作为工具用的外语了。

这简直有点近于一个悲剧。这悲剧的主要原因,据我看,就在教学法的不健全。自从学字母起,学生就完全依赖教员。教员教一句,学生念一句。一直到后来学到浅近的读本,还是教员逐字逐句地讲。学生从来不需要自动地去查字典,学生仍然不能知道直接去念外国书的困难,仿佛一个小孩子,从生下起就吃大人在嘴里嚼烂的饭,一直吃得长大起来,还不能自己嚼饭吃,以后虽然自己想嚼也觉得困难而无从嚼起了。

我们既然知道了原因所在,就不难想出一个挽救的方法,这方法据我看就在竭力减少学生的依赖性。教员应该让学生尽早利用字典去念原文,他们应该拼命查字典,翻文法,努力设法把原文的意思弄明白。实在自己真弄不明白了,或者有的字在字典上查不到,或者有的句子构造不清楚,然后才用得着教员。在这时候,学生已经自己碰过钉子,知道困难的所在,而且满心在期望得到一个解答,如大旱之望甘霖,教员一讲解,学生蓦地豁然贯通,虽然想让学生记不住也不可能了。这样练习久了,我不信他们会学不好外国语。这方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在外国,最少是在我去过的那个国度里,是最平常的。我现在举一个学俄文的例子。第一点钟教员上去,用了半点钟的时间讲明白俄文在世界语言里尤其是印欧语系里的地位,接着就念字母。第二点钟仍然念字母。第三点钟讲了讲名词的性别和极基本浅近的文法知识,就分给学生每人一本果戈理的短篇讽刺小说《鼻子》,指定了一部字典。让每个人念十行。我脑筋里立刻糊涂起来,下了堂用了一早晨的力量才查了六行,有的字只查到前面的一半,有的字根本查不到,意思当然更不易明白。心里仿佛有火在燃烧着,我恨不能立刻就得到一个解答。好容易盼到第二堂上课。教员先让学生讲解,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讲一个整句。结果还是他讲,大家都恍然大悟,不自觉地轻松地笑起来。他接着又讲了半点钟的文法,才下了课。就这样,在

一个学期内念完了初级文法和果戈理的《鼻子》。

这教法或者有点霸道,我承认。学生在课外非有充分的时间来预备不可。但是成绩却的确比我们大学里流行的教法好。除非学生低能,在两年内一定可以看普通的书。与其让学生不痛不痒地学上两年结果是等于白学,何如让学生多费点力量而真得其实惠呢?

19世纪德国大语言学家 Ewald 就用这方法教学生,而且应用得还特别认真。跟他念过书的学生一谈起来没有一个不头痛的。后来他自己也听到了,就对人说:“学外国语就像学游泳。只是站在游泳池旁讲理论,一辈子也学不会游泳。我的方法是只要有学生到我这里来,我立刻把他推下水去。只要他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我希望中国的教员先生们有推学生下水的勇气,青年同学们有让教员推下水去的决心。

1946年10月31日 北平

论自费留学

昨天(11月10日)在天津《大公报》上读到汪敬熙先生的星期论文“自费留学万万不可开放”，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自己好多年来想说的话，汪先生一下子都给说出来了，他仿佛替我在心头扫去一片积闷，蓦地觉得异常轻松起来。倘若金圣叹看了这篇文章最少也要浮上一百大白。

但是有一点汪先生说得还不到家。也许汪先生有心存点忠厚，没有尽情地说。汪先生只说：“纨绔子弟之中不是没有好的，不是没有肯勤学的，不是没有学有成绩的。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在外国是荒嬉游戏，挥霍无度的。他们自己是以为这样方显出家中富有。然而在外国人眼里，他们所作所为都是可以耻笑的。近些年来他们真是为国家招来耻辱！”无论谁只要亲身在外国见到过这些纨绔子弟的，都会知道汪先生这些话是怎样含蓄而厚道了。

我自己在欧洲的一个大国里住过十年、一个大国里住过半年，也见到不少的事情。初到那个大国的首都的时候，天天在街上、饭馆里遇到的就是这些纨绔子弟，每个人都是把眼睛安置在头顶上，上下打磨得耀眼明亮，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念哪一门学科，因为他们很少与学校发生关系。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不紧张。每天一起来就到中国饭馆去。吃完早点，找几个同志下一盘棋，闲谈一下，就到了正午。午饭当然就地解决。吃完又结队出去逛马路看电影。晚饭再回中国饭馆，吃完又出去看戏坐

咖啡馆或到其他他们所想去的地方。每人都少不了三“机”：照相机、无线电收音机和野鸡。外国文很少有几个通的，但也用不着。因为他们所接触的外国人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不三不四的女人，同他们在一起嘴还有更重要的用处，不是用来说话的；再一种是警察。这些英雄们贩卖黑钱或犯了其他别的罪，倘若逢巧父亲是大使，自然可以大模大样地掏出红护照来吓外国警察。其余的就不免捉将官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用不着说话，反正只要能听懂判多少年月徒刑就可以坦然走进监狱里去。等到出来的时候，又可以到处尤其是在中国饭馆里高谈雄辩，叙述他们在狱里的丰功伟绩。据说在里面每人必须做手工，编点什么。他们只学上几天，就可以教同狱的外国难友。这些外国人当然钦佩得五体投地。这样他们就很替中国争了些面子。旁人听了对这些为国争光的英雄也不免肃然起敬了。

这样说也许有人以为太笼统了。我现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院长的公子。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很久了。至于在那个大会里做了些什么，我不大清楚。但以后我们竟然得到一个机会同学过半年。我们差不多天天在一起吃午饭；但一直到他离开学校，我始终不知道他学哪一科。从他的谈话里我知道他听过耶稣教的神学，听过体育原理，听过微积分，听过流体力学，听过生理学，听过法律，对这些他似乎都没有什么兴趣。他念念不忘的只是医学院的产科讲演。他常常向我用很生动的姿态表演他在课堂上听到的女人生产时的情形，同时复述教授的一句话：“男人无论如何英雄，无论能征服多少国家，也没有女人生产时那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力量。”于是他也就对女人的伟大赞不绝口起来。但他也有他的伟大，在街上只要看到漂亮女人，便跟上去，百折不挠。挨了耳光，仍然是面不改色，不由得也让我赞叹起来。

第二个是一个上海大商人的儿子。据说从小就学那一国的语

言。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住了八年。有一次替一位中国老太太写一封请求信,拿到财政局,外国人说看不懂。这位老太太拿给我看,我才知道他替我们当时住的那一国造了一种新文字。后来他又从另外一个国度寄给她一个中文(记住是中文)明信片,老太太年纪大了,有些字认不清楚,又拿给我看。我又发现他替我们中国造了几个新字,创了一个新文法。他虽然学的是航空工程,但小代数和平面几何都弄不清楚。外国同学都奇怪,他就告诉他们,中国的逻辑和外国不同,数学也另成一个系统。这位先生在那里住了十几年,一天忽动归兴,临走告诉我,他回国要“组织”飞机。我用十二分的虔诚祝他成功,虽然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是“组织”飞机。

上面两个例子,一个代表荒唐,一个代表低能。作风虽不同,但总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各擅胜场。类似这样的英雄我最少也还能举几十位来。我虽然不久就离开那大都会,无缘继续欣赏他们的伟业。但在下风遛听之余留在脑海里的故事也足够写一本四百万言的留西外史。无论谁都可以想象到这些人在外国替我们国家招多少耻辱。在外国浪费金钱还是小事。

这些人物最好都留在国内,当接收大员也可以,当什么什么专员也可以,无论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出国,因为外国人没见过中国,只要看到一个中国人的举动,他们就会想到全中国的人都这样。难道我们就甘心让这些人到外国去代表四万万人宣扬中华民族的伟大么?

我们都应该起来拥护汪先生的主张!我也同汪先生一样希望舆论界给我们鼓励!

1946年11月11日

邻人

古书上说：“德不孤，必有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德，但邻人我却是有，而且很多。因为我现在住在一座外面看上去似乎像工厂的大楼上，上下左右都住着人，也就可以说都是我的邻人。

古时候有德的人的邻人怎样，我不敢说，也很难想象出来。但他们绝对不会像我现在这些邻人这样精深博大，这是我可以断言而引以自傲的。我现在的邻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专家。说到中国戏剧，就有谭派正宗、程派嫡传，还有异军突起自创的新腔。说到西洋剧和西洋音乐，花样就更多。有男高音专家、男低音专家、男不高不低音的专家。在这里，人长了嘴仿佛就是为了唱似的。每当晚饭初罢的时候，左面屋子里先涌出一段二黄摇板来。别的屋子当然也不会甘居人后，立刻挤出几支洋歌，其声呜呜然，仿佛是冬夜深山里的狼嗥。我虽然无缘瞻仰歌者的尊容，但我的眼却仿佛能透过墙壁看到他脸上的青筋在鼓胀起来，脖子拼命向上伸长。余音在长长的走廊里回荡，我们这房子可惜看不到梁，不然这余音绕在上面怕是永远再不消逝了。岂能只绕三天呢！古时候圣人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我听了这样好的歌声，吃到肚子里去的肉只是想再吐出来。自己发狠也没办法。以前我也羡慕过圣人，现在我才知道，圣人毕竟是不可及的了。

但这才只是一个开端。不久就来了乐声。不一定从哪间屋子里先飘出一阵似乎是无线电的声音，有几间别的屋子立刻就响应。